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CHUANTONG YU XIANDAI ZHIJIAN



传统与现代之间

——成都文化符号研究

王晓路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传统与现代之间

——成都文化符号研究

王晓路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与现代之间——成都文化符号研究 / 王晓路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12. 11
ISBN 978-7-5531-0168-2

I. 传…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史—研究—成都市
IV. ①K297.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2807 号

传统与现代之间

ChuanTong Yu XianDai ZhiJian

王晓路 主编

——成都文化符号研究

Chengdu Wenhua Fuhao Yanjiu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 bsbook. 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8. 25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168-2

定 价 28. 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曹顺庆

编 委：冯宪光 王晓路 李 怡

徐新建 刘亚丁 阎 嘉

吴兴明 段志洪

秘 书：王彤伟

目 录

绪 论

都市图景与文化建构 王晓路/1

城市形象研究

栏目语:城市文化形象

——行进中的文化符号实践 曾庆熹/21

公共场所用字规范化与城市形象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 王韬 朱姝 肖薇 黄琳/23

城市文化符号建构中的话语互动

——成都市“城市形象重塑与提升”系列平面公益广告

文化批评研究 曾庆熹 孙哲 朱琪/48

旅游历史资源研究

栏目语 邓 静/75

从金沙文化品牌经营看成都城市文化符号构建

..... 李 瑛/79

试论古镇品牌塑造中的文化营销

——以四川古镇黄龙溪为例 赖 秦/98

从锦里看成都仿古街区的文化建构和商业运作

..... 邓 静 张 莹/118

商业饮食文化研究

栏目语 刘韵飞/138

成都茶馆与成都城市文化研究

——以成都公园茶馆为例 闫谨 陈英 朱昕笛/141

成都咖啡文化研究 葛 孟/173

成都川菜文化研究 张 茜/197

成都农家乐研究 刘韵飞 王小琴 韩田田/223

撰稿人简介 252

都市图景与文化建构

王晓路

现在这个集子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青年教师和文化批评专业近几年研究生的集体成果。文化批评专业是四川大学在21世纪初设立的二级学科专业，该专业可能在国内也算比较早的，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承担了这个专业的学位课程，为博士生开设“文化研究”选修课和硕士生的“文化批评”专业课，同时也招收该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由于国内大多数本科院校当时并没有开设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这一类的课程，所以一些学生大概是出于对“文化”的好感报考了这个专业，也有的是在报考研究生时被调剂到这个专业的。他们大多来自中文专业，也有外语、新闻传播、经济和其他文科专业。进校以后，他们通过选课和阅读，对这个既注重传统的文字符号文本、同时也注重社会文本的专业方向有了一些切实的感觉。一些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的同学也参与其中，并利用课程要求以小组形式进行相关的社会文化产业项目调研，讨论有关的论著和文化现象，在课堂上，或在他们自发的读书会上进行交流、演示和总结，因而成长得还比较快。我们几位老师在课程指导中欣喜地看到近几批学生的成长尤为突出，由此我也想到了从学科特点出发，或许可以探讨培养研究生的可能

模式，于是萌发了以课题方式锻炼他们的观察、思考、论证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着重点是让他们对现在所在的城市文化现状进行某一专项的观察，以此奠定今后深入研究的基础，其中有一些文章亦是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这个课题后来经过反复讨论，中途也有个别的年轻老师或学生因不同原因不能完成课题论文而退出。这是文集最后形成的成果样式。

20 世纪中叶源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以及更早的文化批评之所以蔓延到其他文化区域，与全球格局下的当代社会发展模式有关。全球金融、资本、科技、人才和资源构成一个互为结构的连锁市场并形成全球产业链。它不仅构成新的资源获取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贸易统一规则下构成了重新分配的方式。不同区域因历史的原因虽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但在这一巨大的动力下都被置于该产业链的某一环节上，并由此构成各区域不同的内在矛盾和外在表现形态。与此同时，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的新格局也构成了经济文化的新版图。这种社会文化现状是与以技术为先导的经济运行方式、金融资本同一性市场的关联性以及资本跨界引发的文化资源被大量挪用并被转化为商品本身的现象分不开的。在学术层面，这一不断重新定位与互为关联的发展或牵制格局所引发的深层次的区域及社会问题，却又使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对于问题的揭示力度和阐释方式显得比较乏力。因为，当代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单从传统的哲学或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等角度已经难以充分说明。于是，人们重新借助了“文化”这一最为基础的词汇，以此展开以文化为中心的认知图示和分析结构。文化研究模式在中国大陆的当代复制亦有其接受的基础。人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文化学转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演进尤为明显。由于作为概念的文化有着庞杂的指涉，因此，人们借助文化进行言说时，总是在

不同语境下的行为，存在着不同的语义指涉和言语差异。于是，当这些最为基础的词汇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成为通识性的术语并得以广泛使用之时，它其实证实了语言的一个自主调整功能，就是其附加含义可以随着使用者的有意或无意为之而得到扩延。而越是那些基础的词汇，其扩延的能量就会越大，由此构成研究范式的语汇范畴的关键词。就中国大陆目前的发展而言，这一新的解释范式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借鉴西学的“文化研究”资源，包括其中的理论资源和批评方法；二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以及当代学术发展使然。这同时也印证了中国大陆当代学术在外部条件改变的前提下，存在着多重资源的内在动力方式。

“文化”亦离不开“文”。“文”在中国文献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早期文献中的言说一直持有热情。如英国最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对《易经》的翻译和处理也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文化中的许多精髓都在《易经》这本书中揭示出来。具体到“文”，《易经·系辞下》中就有“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①之说。而文、文字、文学及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在《易经》中得以说明，“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②。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文”也得到过最为壮美的表述，他开篇就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

① 《周易》，（英）理雅各英译，秦颖、秦穗校注，秦颖今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336页。英译还可以参考 *I Ching: The Classic Chinese Oracle of Change*. Trans. by Rudolf Ritsema and Stephen Karcher. Shaftesbury Dorset Rockport Massachusetts Brisbane Queensland: Element, 1994.

② 《周易》，（英）理雅各英译，秦颖、秦穗校注，秦颖今译，前引书，第318页。

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①从物至文，以文言物，文自万物，道法源圣，这种强调语言文字符号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互为指涉的观念和智慧以及文化的遵从性在中国文化中可谓源远流长。从具体的文辞、文饰、文采到意指抽象的社会群体的文化呈现，其间的演变极为丰富和复杂。但中国传统中的社会性内涵却一直深深地隐藏在“文化”之中。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外部条件决定了该群体的生存方式。所以，群体文化的呈现方式与其组织方式总是密切相关。农业生产方式的早熟和与周边部落，尤其是游牧民族的交流、融合与对抗、土地贫瘠和常年的精耕细作、经济增长与人口压力等等，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的几组矛盾。这些长期难以解决的固有矛盾使得支配性阶层和知识群体均极其关注社会管理的有效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文化”一词在汉语文献中的含义主要是教化功能，即该词义是在社会功能层面上展开言说的。汉刘向就有名句：“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②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智慧的社会管理方式显然是以科举制为中心辐射开来。在这一体制下，经典的与文辞的合二为一，圣言与大道、个人价值与江山社稷的高度统一，家庭血缘与现实生活的改变与科举后的可能效果直接挂钩等等形成了整体的观念系统，而该系统又作用于对人的弹性管理方式。于是，竭尽全力进入该体制的成本显然低于从体制外对抗的生存方式。因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体制外的异己力量难

① 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96页。此段的断句和标点等在龙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10页。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② 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0734页。

以形成与之对抗并从内部对其进行瓦解的要素^①。所以，科举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先生对此有着经典的研究。他认为，“‘士大夫’作为一广泛的社会称号始于两汉之际，恰好与科举（广义的）制度的成立相先后，这决不是偶然的。所以从社会结构与功能方面看，从汉到清的两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特别如唐、宋以下的‘进士’），‘士’直接进入了权力世界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取得了制度的保障。这是现代学校的毕业生所望尘莫及的。着眼于此，我们才能抓住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人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区别”^②。若看待同样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这样一种管理方式以及不断强化的社会观念在社会上运行的结果，与欧洲刚性的血缘制度所形成的社会模式是完全不同的^③。当我们重新对历史进行考量时，可以发现当时的这种非宗教的文治与教化的社会管理举措尽管与现代社会管理模式有着天壤之别，但在社会观念形态的功能方面却有某些契合点。因为，宗教在政治经济性的意义上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因为组织群体获取资源和进行战争必须要依靠超越家庭血缘的村落结构。于是，观念和意识成为重要的手段。但是从工业社会之后，社会有效的管理方式却必须依靠法的普及和推进才能取得最为基础的合法化。但文化的关键要素依然是社会层面。所以，一个区域的文献文化传统往往构成该群体的精神文化的品格，而其社会的制度文化传统却是群体民生状态的制约

① 参见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39页。具体见第七章第二节“判断中国封建社会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基本依据”。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③ 参见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前引书，第409—414页。具体见第六章第三节“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关键性因素：体制外权力中心和体制外异己力量的形成”。

要素。诚如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学者雷蒙·威廉斯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时,就将文化在“理想”、“文献”与“社会”三个层面加以了区分和言说^①。因为在威廉斯看来,文化“记录了一个真正的社会历史,以及一个非常困难与困惑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②。将文化定位在当代社会文化层面可谓是非常符合 20 世纪以来整体的社会文化状况的。一部文化史也是一个群体的生活状况史和社会图景的展示史。换言之,从社会角度往往更加能够透视出文化变迁的内在图景。

自古以来,人类各个群体在自然定位的区域中,以其自然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方式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文化样式^③。其中,外部环境和相应的物化条件制约着群体适应性的文化特点,也形成了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传统惯性。这种文化主要是在自我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相互隔绝的状态只是远距离的。从大河流域展开的几个重要的古文明形态来看,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和黄河流域这些古文明区域,就其各自的文化形态而言,其实一直和周边各个民族不断发生着交往、影响和融合,并不完全是各自封闭的。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历史就很难脱离自身的历史和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史。其内部主要是指中原内部的反复兼并。而其外部则是和草原帝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以及和包括北部、西域、东南亚周边各区域的交往史。在汉字中,几个专门描述周边地区的词汇都特别具有历史文化意味。如将西部族群称之为“西夷”,西北部为“西戎”;对北方群体称之为“狄”;对东边的族群多称之为“夷”;对南

① See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pp. 57-70.

②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9页。

③ 参见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Ⅺ页。

方族群则称之为“蛮”，《诗经》中就有“用戒戎作，用逖蛮方”，后来“蛮”又延伸为现代汉语中“野蛮”、“蛮横”一类的表达。若考察中国大量的历史文献，如《汉书》一类的典籍，对“匈奴”、“胡”等称谓的描述在不同的文献中都有些变化。“匈奴，古代我国北方民族之一。也称‘胡’。先后叫‘鬼方、混夷、猃狁、山戎’。”^①总之，这些词汇后来都在不同程度上附加了“不文明”或“野蛮”的成分，而对这些“外族”称谓的考察即是一种文化史的考察。所以，文化区域中的“我”与“他”、“内”与“外”其实都是相对而言。许倬云先生对中国文化史中的这些关系比较清醒，也述说得比较集中，“战国时代，中国地区的逐步融合，由上述的‘分’趋向‘合’，新的‘我者’，覆盖面广大，边界向外伸展，遂难免接触原来未必相接的外人。战国时代开始，扩大的华夏之国，遂多了北疆的‘胡人’。过去蛮夷戎狄指涉的水草而居。这一生活方式，不再依恃小规模农业，却必须有外联贸易网”^②。其实这些“内”与“外”的视角均不过是区域周边地区的交往而带来的。同时也说明，这些比较频繁的交往是这些区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历史，而更遥远的区域群体之间发生直接的或大规模的交往则是后来的事了。

英文的相关词汇大致也有好几个，这些描述异族的词汇大多与非希腊、非罗马或非基督教的族群有关。其中用得最多的barbarian就与“原始的”(primitive)、“缺乏文化”(lack of culture)、“野蛮”(savage)、“凶残”(cruel)、“粗糙、无教

① 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前引书，第0209页。

②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7页。

养”(coarse, unmannerly)或“异国”(alien, foreign)有关^①。这些词汇与英国史、北欧海盗、罗马帝国以及宗教战争史都有关系。然而后来的发展,却使得中国上述一些固有的表达发生了变化。其中,晚清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双方对“夷”和英文“barbarian”的理解和翻译均成为一个互为指涉的用语,最后由于强弱差别过大,导致那些合约文献中对该词的禁用^②。所以,国力与语言的关系也成为个颇有意味的深层文化问题。

自17世纪以来,全球各个文化区域的群体在新的生产方式以及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相互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开始加速,其中尤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了社会模式的改变,随之而引发了观念的转变和不同的文化呈现方式。市场、生产、流通带来了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新的认识,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也同时成为了群体迁徙的内在要求。对于人类而言,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并非只是停留在物理空间层面,或是获取物资资源方式的改变,而主要是心理和文化空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因此,作为概念的全球化以及作为发生学的全球化在时间的维度上,并非是一致的。彼得·斯特恩斯大概是对全球化的源起梳理得最为集中的学者。他在《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中对各个时期都做了系统的、互为关联的考察。他认为全球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全球化的历史,只是这样一种同一性在各个阶段中拥有不同的特质。他将全球化的源起分为几个主要的阶段:“接触的起始模式:1200BCE—1000CE”;“转折点:1000CE”;“作为转折点的1500年代:全

① David b. Guralnik ed.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William 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80. p. 112.

② 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9—72页。第二章第二节“谁是野蛮人”、第三节“‘夷’字之辩”、第四节“野蛮人的眼睛(The Barbarian Eye)”。

全球化的兴起?”；“作为全球化的 1850 年代”；“194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一种新的全球史？”^①在他看来，全球化的最初起源就是从群体接触开始的，只是这种接触的目的、范围和后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不尽相同。美国哥伦比亚教授，现任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的廖炳惠也指出：“但实际上，‘全球化’这个活动早已行之有年，并不是晚近五十年才开始的新论述，二三百年前奴隶人口的贩卖 (slave trade)、殖民及帝国主义的活动，乃至跨国贸易所引发的掠夺、交易和互动，都是‘全球化’之下为时已久的现象。”^②

但是，在 17 世纪以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农业的支配性方式已经逐步被工业生产方式所取代，而原料、运输、生产、加工、市场以及最为重要的金融成为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凡是纳入全球化轨道中的各个区域都出现了一些共同的“全球化”特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区域越是和其他区域接触得多，该区域的全球化特质就越明显。与此同时，凡与之不相融的社会、生产和人事管理模式，亦受到巨大的冲击，在某种“公共方案”的前提下，国家、区域间契约的重要性获得空前的提升。在这种经济规则和市场作用全球化的格局中，区域的边界随之蔓延，跨界成为历史的使然和群体发展的必由之路，空间的问题演变为新的文化格局。空间理论家爱德华·索亚对此有着经典的论述：“人类从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着，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③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构成全球化新

① Peter N. Stearns.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See p. 10; pp. 29—56; pp. 57—89; pp. 90—123 and pp. 158—161.

② 廖炳惠《关键词 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20 页。

③ 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 页。

的空间图景，而各区域的文化在新的空间图景下显现出了某些类似的现象。于是，在强大的媒介和观念介入的作用下，消费同质化和消费文化心理影响方式开始蔓延，商品的符号价值得到巨大的提升，地理的内涵延伸为文化地理和心理地理。而各文化群体在这一全球产业链被迫重新定位。这使得许多群体在巨大的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生存需求，并寻求扩大需求的方式。由于金融资本的快速流动，各区域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上升到空前的地位，几乎与传统的金融资本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因为，金融资本的覆盖和流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使然，而其所在，也是地方性文化资源得到空前利用或被挪用的时期。社会文化状态和文化呈现方式由此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全球化引发了深度的都市化，人类群体和城市空间的关系也变得日益重要，这是因为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空间进程的加速，而越来越多的人将居住在城市之中，“预计 2025 年将有 60% 的人生活在城市”^①。城市成为了群体迁移的首选地，而且移民不断地涌入，也使城市成员的构成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时至今日，欧洲、北美、亚洲等世界各地的群体日益混杂，而且其主要活动空间都集中在城市之中，所有更迭、变幻的文化现象也都集中在城市之中。可以说，中国大陆的当代都市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在地域上涉及面最广、在人口中牵涉最多、在影响力上最深入、在时间段上最为集中的一次。它本身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同时，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主要的呈现方式和相互关联的问题也都与这一次都市化的进程相关。

由空间带来的变迁、以都市为中心的人类群体行为，不仅仅改变了生活样式，而且使得 19 世纪中叶形成的、并在 20 世

① Allen G. Johnson, ed.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Blackwell, 1999, p. 307. 转引自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前引书，第 1 页。

纪得到极大发展的以人为中心点展开的学科逻辑发生了变化，一种综合性的思考方式以及对都市文化为重点的分析方式随之凸显出来。城市文化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后现代城市的实质、社会与经济特质，及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些问题持续引发了许多讨论。这场争辩里的主题，包含了许多当代文化研究的母题：地方、社区和空间里的主体性与认同及其体现；现代主义的漫游者（flâneur）与当代都市里环绕着性别和族群而组织之认同的关连；后殖民的主题、主体与概念（杂种、流离），对于第一和第三世界城市概念化的冲击。”^① 而在一个文化区域内也形成了地理性差异，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如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之分，就是比较典型的类分方式。沿海城市不仅意味着生活质量，而且主要暗含了管理的规范性、人口总体素质以及个体和企业发展机会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目前存在的高校布局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现象，就说明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其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等命题均意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背后的附加问题。就文化层面而言，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意味着更加开放、观念更加解放、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体现着更规范的社会管理，而由群体所呈现的社会文化面貌也更加不同，而内陆城市则可能相反。所以，就整体而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也存在中心与边缘的现象。因而人们既需要关注其发达区域，更需要特别关注其内陆地区。唯此，就可能看到更多的问题。就学术而言，对一个文化区域内的不同类型城市均加以观照，尤其是对内陆城市的关注，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中国城市史是其丰厚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全

^① 彼得·布鲁克《文化理论词汇》，王志弘、李根芳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46页。